

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政治变更和革命斗争，都是以农村及农民群众的揭竿而起、攻城略地为主要形式。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无论其成败如何，都是如此。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也是以农村暴动或在农村兴起为特征，随之向广大的城镇地区发展。只有辛亥革命，是以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动以及市民的参与为特征，达到推翻封建王朝，以资产阶级政权取而代之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有何制约和影响？这就有必要对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市民等级的地位、社会心理意识及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及革命运动的关系加以探讨，从而说明城市市民等级对辛亥革命成败的实际影响。



辛亥革命为什么采取城市起义和响应及政治变动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城市市民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联系，亦即探讨中国近代城市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土壤的问题。

中国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与西欧不同的道路和特

点。西欧城市经历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交的毁灭与重建的过程，新兴的城市成为人们逃避封建剥削的渊藪，并且逐渐获得了自治或独立的权利，城市居民形成了逐步摆脱封建关系的市民等级，并由此而孕育出资产阶级。而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它的盛衰荣枯是与其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不会出现任何一个获得自治，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欧洲一样的市民等级”^①。具有资本主义意义的中国近代城市和类似于西欧的城市市民等级，是 20 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的产物。

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渐次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到 20 世纪初年才逐渐显示出独立的趋向。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成为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意识的社会力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城市为其发展场所，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基地，广大的农村则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根据资料统计，1895—1904 年期间，在全国总资本额和设厂数分别为 2814.5 万元和 143 个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无锡、天津等六个城市就分别拥有 1589.6 万元、厂矿 50 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59.7% 和 35%。^② 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仅江苏一省在 1895 年至 1913 年间，该地区的上海、无锡、镇江、苏州、南通等城市，厂矿数

①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根据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654 页统计表累计，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就占全国总数的 23.48%。^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格局，造就了一批新兴的近代城市，使它们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及资产阶级活动的主要基础。

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居民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从而形成了类似于西欧中世纪末期、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城市市民等级。这是一个与西欧城市市民等级同质而不同时代的新的社会力量，他们中间，一部分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身份，但大多数尚处于向资产阶级转化或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联系之中，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中不可缺少的经纬。可以说，他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发展的结果，而他们的进一步扩大和成长，又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中国近代城市市民等级的发生渊源来看，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就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也就是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和革命运动具有着天然的共通点，考察城市市民等级各个部分即可得到印证。

20 世纪初年的城市市民等级，其成分包括商人、企业主、小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士绅、中小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及知识分子。在这众多的各色人中，企业主和一部分商人、官僚因为直接投资于近代企业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城市市民的上层，本身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绅士阶层，即具有不同科举功名、在籍或候补、退休的官吏，居住在城市的土地所有者，此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或者直接投资于近代企业，或者是这些企业的热心赞助者，或者倡办各种市政和新式教育事业而成为所谓

^① 孙敬之主编：《中国经济地理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74

页。

“新派”人物，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也构成城市上层的一部分。城市上层因为具有传统功名和在经济上占据显要而成为城市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政府与一般市民的中介和桥梁。

与此相对应，为数众多的中下层市民群众成了城市市民等级的主要部分。

近代产业工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并且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发展着的社会力量。但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产业工人还是十分幼稚的阶级，他们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同盟军，紧系于城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链条之上。

城市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以及各种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是城镇人群中迅速增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影响日益显著的市民成分。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在 20 世纪初年受到外国经济侵略的冲击愈来愈大，遭受到破产的厄运，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的广大后备军。

同时，他们又备受封建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加速了破产过程，因而产生了与封建统治相对立的意识。而各种新式企业、海关、市政机构中的中下级职员及城市学堂、新闻出版机构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兴起的新市民，他们具有资本主义的知识和思想意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萌发出改造现状的强烈要求，是市民等级中最敏感的一部分，实际上成为了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代言人。

新军，是中国城市市民等级中特殊而又值得注意的一个成分。新军来源于“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受业于新式学堂或军校，因而具有与旧式军队官兵

不同的思想意识，更接近于市民。特别是驻防于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的新军，目睹身染着市民社会的心理、价值和生活方式。对他们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融合作用。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命运，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新军能够在辛亥革命时期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最终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的原因所在。

从对市民等级的各个层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初年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伴随着这个力量的出现，他们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日渐显著和尖锐，由此而产生了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并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市民等级的心理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变更政治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是市民社会心理意识的中心内容。在封建专制社会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从事工商业的市民是受到漠视的，“官与商漠不相关，以商业为个人自谋生计起见，与国家无丝毫关系”^①。市民等级强烈抨击这种观念，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到关系中国存亡的深层来认识，认为要拯救中国，“必自行重商主义始”^②。他们指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于近世之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安危系之。”^③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勇敢地承担起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

①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7—28 页。

② 《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湖北学生界》第 3 期（1903 年）。

③ 《兴商为富强之本说》，《商务报》1905 年第 8 期。

肩其责’^①，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在 20 世纪初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种意识便演化成为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的迫切感：“华商乎，华商乎，其亦念及中国之前途而急起图乎！”^②而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其意识还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③“吾国之不振，……自族不能建立民族国家之故也。”^④城市市民等级的这种政治意识，实际上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相吻合，成为沟通二者联系的思想桥梁。

城市市民等级资本主义意识心理的觉醒，使其与封建专制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与对抗心理也日益成为自觉的形态，这就促使了市民等级在组织意识上的觉醒，从而建立起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市民组织形式，以反映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要求，这就是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的各种城市自治机构、市政团体以及市民公社。这些组织中最为普遍的是商会。根据资料统计，从 1903 年至 1912 年，全国城镇设立的商务总会及商务会所达 928 处，拥有会员 20 万人以上。^⑤这种情况表明，商会已成为城市市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形式。从一般情况来看，商会作为城市工商业者的组织，“顾名思义，一以商务为指归”，所从事的活动自然是以讲求振兴、保护工商业为主旨，集中反映城市市民发展工商

① 《兴商为富强之本说》，《商务报》1905 年第 8 期。

② 《东方杂志》第 1 年第 3 期。

③ 《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 年第 1 期。

④ 《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11 期。

⑤ 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业的经济愿望。但近代中国城市工商业发展所处的来自封建的、外国资本的障碍而造成的艰难环境，又必然使商会成为城市市民的政治团体，成为他们抗衡官府、洋商的政治力量的聚集。这就使其能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市民等级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封建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城市中，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市民等级通过它参与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以至管理，并力图使其成为清末城市自治的机构，与清朝的封建地方政权争夺地方政治权力，实现对城市市政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控制。在一些城市，商会还建立了一系列下属机构，如救火会、体育会、教育会、劝学所、警务公会、拒烟会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的市民公社，它宣称其宗旨为：“资群策以谋公益，为地方自治团体中之一自治团体者，即我市民公社之原素也。公社以自治为原素，当其组织之始，虽警于宫巷之两火，而实则自治原理，因早为吾人所久蓄而待发也。”^①俨然成为城市地方自治的机构。在上海，也出现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的机构，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为指归，^②成为参与城市管理和维护市民利益的机构。

商会的这种发展，自然引起城市地方封建政权的不满，导致二者间的矛盾。实际上，在某些城市，也发生了如同西欧中世纪末城市市民等级摆脱封建统治、争取城市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现象。如上海、苏州商会在清末为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置与控制权而与地方当局发生的矛盾与争执，只是由于中国近代城市封建势力强大，市民等级的这种斗争尚只表现为一种偶然和罕见的现象，

① 《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杨逸等：《上海自治志》，“大事记”，第 1 页。

并未导致西欧那样普遍的形式和产生独立的城市。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市民利益成长的条件。

商会在市民等级中的领导作用，促使他们日益觉醒的政治意识凝集为有组织的流向，变为参与实际政治运动的行动。

1903 年的拒俄运动是市民等级参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起点。当 1901 年中俄密约签订时，上海市民，特别是商界人士，号召“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绅均极宜设法”，“以助声势”^①。而当 1903 年拒俄运动全面铺开，市民们的自我意识更为清晰，已经明确把救国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来，他们说：“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住居最繁，……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情，本爱国之天良……勿失商家体面为要。”^②并且明确地宣布，“凡关系于中国之事”，市民“例得干涉之”^③。在其他城市，如武汉、南京、芜湖等，也出现了市民的拒俄运动。拒俄运动的开展，不但使市民等级增强了参与政治斗争的自觉意识，而且也促使市民等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从改良的樊篱中冲出，接近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对于此后城市政治运动的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作用。

继拒俄运动以后，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运动日益发展，特别是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是由商会及其他市民团体组织和领导，卷入了整个市民等级的各个层面的城市政治运动，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市民运动的一个高潮。在这两个运动中，不但是利益关系紧密的城市工商业者踊跃参加，而且市民下层，如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主和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城市劳动者，也成

① 《上海合埠同人公后传单》，《中外日报》 1901 年 3 月 18 日。

② 《中国国民总会知启》，《苏报》 1903 年 5 月 1 日。

③ 《中国国民总会提议各案》，《苏报》 1903 年 5 月 8 日。

为了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且表现出比城市上层更为坚决和彻底的精神。如当时报刊所评论的那样，“华人这次抵制主义，有条不紊，无远弗届，其团体之固，殊出人意料之外”^①；“在中国实为从来未有之现象”^②，“殆有震撼四百余州之概”^③。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参与政治的自觉意识程度，也使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交融及组织联系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它们成为代表当时中国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地区和社会政治力量。

在经济上，城市市民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相联系，城市聚集着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与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相对照，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吸引着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城市经济在一定范围内领导着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等级则成为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代表。

在政治上，城市市民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已经不满于封建专制政府的种种压抑和扼杀其发展的现状，产生了要求政权变更政治形式的愿望。“君权至上”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遭到猛烈的抨击，“嬴秦暴政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④，君主“抑人民之自由，抑人民之平等，而使之流离困苦，不得其所”^⑤。

① 《1905 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5 期。

② 《中外日报》1905 年 8 月 18 日。

③ 同上。

④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 1 期。

⑤ 《原国》，《国民报》第 1 期。

他们要求破除这种制度，“吾国民欲享受平民政治之权力，其必自倒寡人政治始；吾国民而欲沐浴治国之幸福，其必自破专制治国始”^①，实现“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被治者”的民主政治。^②市民等级的这种政治要求，反映了他们要求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形式的迫切要求。

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上，城市建立的一系列近代化的文化设置如新式学校、新闻出版事业，成为传播新的信息的媒介，从而使市民的文化心理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心态。传统观念发生变化，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被抛弃，君臣、忠孝、恕悌、节义之类的陈腐观念被斥为“放屁话”，“如今不必相信了，无所谓名分，无所谓尊卑”^③，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准则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成为市民等级追求的目标。男女之间的尊卑关系也因“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观念的出现而开始动摇。^④关于人的个性，那种“既无自治之才力，亦无独立之心”的奴隶劣根性也被大加挞伐，要求养育具有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的“社会魂”，即新的个性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一切观念变化，渗透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市民的文学意识上。

城市市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新变化，使城市成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展的场所，从而为 20 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想的社会环境。这一趋向为从事

① 《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 6 期。

② 《说国民》，《国民报》第 3 期。

③ 《论刺客的教育》，《中国白话报》。

④ 《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第 3 期。

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们所日益关注和认识。他们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成败时开始认识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于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①因此，他们感觉到，“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②。这里所说的中、下等社会，根据他们的解释，主要是指城市市民等级。^③随着市民等级政治意识的觉醒与团体及其政治运动的兴起，革命派的认识也愈益加深。毫无疑问，革命派从 19 世纪末以来的斗争实践也提供了一定的教训。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发动的数次以会党为主力的武装起义，都未曾达到推翻封建政权的目标，这就说明，会党，或者说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实际，使农村地区所受到的资本主义影响，还远远不足以使农民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和观念，因而也不能造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激发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有着根本利益关系的城市市民——所谓中、下等社会的革命意识，使资产阶级革命与滋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土壤相结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获得胜利。因此，自 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城市的活动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即城市市民等级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力量之后，革命派的城市活动日益显著。在革命派当中，“革命起义不可专恃会党”的呼声也愈益高涨。以 1908

①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5 页。

②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 1903 年第 3 期。

③ 杨笃生：《新湖南》。

年的安庆马炮营起义为起点，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着手发动城市市民等级特别是新军及城市知识分子参与的武装起义，此后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等，都是在城市的起义。孙中山本人也改变初衷，由“借会党暴动”转向会党与城市新军的“双方并进”的方针，并最后专注于城市及新军的斗争，特别是 1910 年以后，孙中山不再提会党而注重于新军及其他城市市民。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城市的活动，使城市及其市民等级愈益接近革命，出现了浓烈的革命气氛。宣传革命的书刊如《革命军》、《警世钟》之类，一版再版，大行于市，“普及被感，颇速而大”^①，“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②，城市出现了“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革命书刊的情景。^③受到革命思想影响而倾向革命的市民群众，也日益增多。市民在革命思潮的冲击下，“无不精神奋发，人人皆有革命之志”^④，“社会图谋革命之潮流，乃与日俱盛”^⑤。随之而来的便是具有革命性质或对革命推波助澜的市民政治斗争连绵发生。工人的罢工，商民的抗捐抗税斗争，构成辛亥武昌首义前夕一幅动荡的城市政治图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市民的罢市斗争，成为了市民斗争最普遍而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根据不完全统计，在 1906—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各城镇市民发起的罢市、罢工斗争不下于 200 余次，其中商人的罢市在 1910 年为 10

① 《邹容与革命军》，《革命人物志》第 6 集，台北，1971 年 2 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5 页。

③ 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1 期。

④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⑤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余次，1911 年则有 20 余次。^①

城市革命气氛的浓烈状态及其市民等级斗争的发展，显示出城市市民等级之心理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选择趋势，表明城市市民等级已经逐渐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正如清政府官吏预言的那样：“推将来内乱之所由生，不在盗贼会党，而在贫民，此其动机一发，必有不可遏制之势。”^②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城市及城市市民等级的出现，城市成为了新的政治经济的聚集点，城市市民等级及其团体这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以城市市民运动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运动的发展，政治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工商业城市。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地，城市市民等级已成为革命的社会基础和主要力量。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等级发生联系并通过城市市民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

二

城市市民等级社会意识的觉醒和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日益转向革命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在武昌首义和各省的独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清末政治格局的资产阶级革命转换，根据对十四个省份独立情况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革命派直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实行政权的转换；三是和平独立的进程受阻，最后还是通过武装起义

^① 据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表》统计，《近代史资料》1982 年第 3、4 期。

^② 《东方杂志》第 7 年第 10 号，《论说》。

实行了独立。考察这三种形式的实现过程，就可以认识市民等级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进行这种考察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武昌首义前夕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态度。如前所述，在 1905 年以后的一系列市民政治运动中，虽然城市市民等级从整体上已具备接受革命的心理状态，但从他们的政治态度来看，主要是城市的中小商人、摊贩、工人和知识分子以及新军等中下层市民比较明确地选择了革命。作为城市市民上层的士绅、大商人和其他与封建经济政治联系较多的人物，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倾向于和平的立宪政治的。清末的国会请愿活动，参与签名的第一次为 20 万人，第二次为 30 万人，第三次预备为 2500 万人。这些人当中，不可能全是具备资产阶级身份的立宪派人，其中大部分是市民，尤其是市民等级的上层人物。这些上层人物不但在城市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而且他们大都通过对城市自治或公益事业机构如商会、自治公所、市民公社、教育会之类的控制，在城市地方政治上也占有优势的地位。各省谘议局成立后，除少数省份确为资产阶级立宪派所掌握外，大多数省份实际上是城市市民上层把持，并试图把它变成市民的政治机构的。市民上层的这种经济和政治地位，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的政治倾向。

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风潮是造成这部分人由立宪转向革命的重要契机。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虚与委蛇、拖延，使市民上层颇觉“哀告无门”，“皇族内阁”的终于出台，最终惊醒了他们“和平立宪”的迷梦，使他们发出“天意难回，人事已尽”的叹息，感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从而认识到“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而无他法”，在思想上大大地接近了革命。^①紧随而来的

^①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

“铁路国有”政策，更严重地挫伤了与铁路权益有极大关系的上层市民，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转向。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样，他们终于选择了革命作为实现其政治愿望的形式。这样，在武昌首义前夕，整个城市及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态度就明显地倾向了革命。

就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局来说，此刻已处于短兵相接的状况，城市及其市民等级的政治转变，为推动革命的迅速到来做出了极为有益的贡献。我们具体来考察一下城市市民等级在革命中的作用。

武昌首义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酝酿策划并以新军为主力发动成功的，上海独立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市民等级在事前事后的推动与支持仍然是相当明显的。在武昌，当革命即将发生之时，立宪派首脑之一的汤化龙，就与其他城市上层分子商讨“密谋革命”的办法，^①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该参加，不应该避开”^②。还有记载说，汤与革命党人刘复基等人保持了联系。^③汤的态度影响了市民上层，“政学界附从者日多”^④，造成了起义前武汉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革命集聚。武昌起义后，武汉市民的大力支持，也是保证首义成功的重要因素。市民组织商会和保安会，在起义伊始是革命和反革命都极力争取的对象，而商会终于倾向革命，表示愿意接受军政府的号令，并重

①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4 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0 页。

③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上卷，精华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15 页。

④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0 页。

整商团，协助军队，维护治安，对起义民军是巨大的支持。武汉商会还决议各商一律开市，所有钱票、银票照旧通行，这对于经过一场政治变乱后的城市秩序的恢复，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它使市场稳定、市民心理安定，保证了革命基地的正常秩序。在整个阳夏战争期间，城市商会、商团及市民提供了全部驻鄂部队的给养，金额达一百多万元，这对革命政府的财政是极大的支持。诚如黎元洪所说：“商人如此慷慨，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矣。”^①此外，商会还组织红十字会救护民军伤员，组织慰劳队“抬牛肉酒食到前方劳军”^②。这一切，都确保了武昌首义和阳夏战争的胜利，正如当时革命党人评论的，武昌的胜利，乃“我商会绅民诸伯叔兄弟之馈送干粮饮料及荷锄执棒之助战追击所致也”^③。

上海的独立，是在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共同策划下进行的。但它与武昌略为不同，上海新军士兵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起来，因而市民团体商会和商团就成为了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早在国会请愿活动失败之后，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沈懋昭、李平书等人就转而与革命党合作，共谋前途，并设立中国国民总会，成为革命派联系上海市民的重要环节。武昌起义后，上海商会的领导人物更与革命党共同策划武装起义，并运用在社会上的地位，出面活动驻沪清军的反正，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武装起义的具体过程中，商团成为了基本力量，没有商团的英勇作战，起义是不可能胜利的。上海光复后，商会和商团继续推动革命的发展，在后勤上他们支持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在政治上他们建立共和宪政会，商界共和团等团体，为共和政府的诞生推波助澜。正如当时报刊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五），第 178 页。

② 邓定人：《武昌首义》。

③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记》，第 91 页。

评论的那样：“上海居民得以安枕无忧者，皆此新旧商团之力也。”^①

武昌、上海是革命党人直接领导武装起义实行政权转换的典型。然而，这种情况却十分鲜见，在十四个省份中仅有三四个属于这种形式，绝大多数是在市民力量的推动下实行的所谓“和平独立”取得政权的。“和平独立”以往常被视为立宪派、旧官僚抵制或投机革命，夺取政权的“假独立”，这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和平独立”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比较普遍的政权变换形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城市市民等级的政治斗争而夺取政权的形式之一。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的形式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途径与方法之一。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城市市民等级已成为城市社会重要的力量的条件下，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形式。江苏、广东是这种形式中的典型状况。

江苏地区 29 个府州县，在苏州光复的一个月内，仅江宁、徐州两地系武力光复，其他都是和平光复。^②我们以省垣苏州光复的情况来考察江苏城市市民等级是如何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

的。

清末苏州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在 1895—1913 年间，它的近代新式工厂企业数就占全国总数的 1.2%，在江浙地区仅次于上海、无锡、镇江，与南通并列第四。^③因此，它拥有比较广泛的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相联系的市民群体，并具备了独立的意识。他们在苏州办企业、兴商学、振兴工商，在苏州城市经济中

① 《不能不归功于商团》，《时报》1913 年 1 月 6 日。

② 李茂高等：《江苏光复与程德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③ 孙敬之：《中国经济地理概述》，第 74 页。